

市井风情水煎包

●李晓伟



图片来源网络

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井风情，莫过于走在它的街头巷尾，用味蕾去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印记。而汝州的水煎包，最能代表老汝州的市井烟火。

如今，在老汝州的城乡集市、街边小摊，很容易看到水煎包的摊点。食客不一定密集，却源源不断；气氛不一定浓烈，却尽兴酣畅。不管你是农人乡民，还是工人干部，在随意支起的小吃摊前落座，吃的是一份随意，一份恬淡，一种市井之气，一种历史余韵。

水煎包属于大众风味的小吃，物美价廉，制作方面不受四季影响，一直是汝州畅销的地方风味小吃。在大街小巷，路边摊点，都能吃到正宗的水煎包。

提起儿时的水煎包，如果您不流哈喇子，算我没说。

市区旧时的包子铺，大都开在中大街，老东关桥头、老十字街、老城隍庙口、老西关桥头，直至延伸到火车站、汽车站门口……汝州老城并不大，但也有十来万人口，主要集中在

中大街，而以前这些包子铺，几乎都集中在这条街上，几乎成为这座小城小吃的代言人。

包子铺出现在汝州已有些年头，即使在儿时，包子铺的门框也已变成了暗红色，墙壁也开始破损，可是这些包子铺的手艺，却令人赞不绝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位于老十字街的大肉水煎包和位于中大街与望湖路西南角的老回民食堂的羊肉水煎包了。

卖水煎包最少需要两个人，一个人擀皮包馅，一个人掌锅，眼疾手快，配合默契。

擀皮包馅者一般为女性，只见她从和好的面团上揪下一大团发面，在案上撒上一些面粉，三下五除二就将面团搓成长条状，左手握住，右手揪面球，也不打眼，噌噌噌，大小均匀的面球就准确地飞上案板。等揪到一定数量，就用小擀杖在面球上一压一旋，面球就变成了圆圆的面皮。

案板上放着一大盆包子馅，高高地隆起着，像一座光滑的山丘。馅的味道和质量直接决定着水煎包的品质，所以做馅尤其重要。羊肉粉条、大肉萝卜两种馅料一直是老汝州水煎包好吃的秘诀所在。

另外，馅里肉多不多，也是衡量水煎包好吃不好吃的重要标准。为了显示肉的分量，他们往往把纯肉馅覆盖在最上面，但只是薄薄的一层。包包子的时候，用竹制的批子顺手一划拉，便拔下来一些肉馅和盖在下面的粉条、萝卜。包包子，大盆里的肉馅也不见少，让人一看直呼：“肉真多”。馅取好，在面皮上一抹，左手一握，五指一拢，一个包子就包成了。

包包子动作飞快，几秒钟一个，几乎让人

人看不清包包子的过程。

煎水煎包的锅是特制的平底大铁锅，口径二尺有余，一锅能装下几十上百个包子。锅一直在火上，那油壶出油成线，在锅底浇上一层油，将生包子一个一个整齐地码在锅里，大火加热，掌锅师傅舀起半瓢水，顺手抖进锅内，“刺啦”一声，水汽弥漫，香气氤氲，赶紧盖上锅盖，大火细攻，慢慢蒸煮，这个过程便是“水煎”。

“水煎”一会儿，掌锅师傅用长条状的铁锅铲一铲下去一推一翻，就将一排包子翻了一个个。翻完后仍将锅盖盖上，几分钟后水分渐少，等汤汁收尽，二次浇油，炸响欢鸣，不一会儿，焦壳成型，把所有的包子连在一起，即可出锅了。

水煎包在烹制过程中融煮、蒸、煎于一体。刚出锅的水煎包，因为仅兼得水煮、汽蒸、油煎之妙，所以色泽金黄，上软下焦，上白下黄，乳白油黄，焦皮儿朝上，一个个码在盘子里，氤氲着扑鼻的香气，既好吃又好看，让人禁不住口水直流三千尺。

只见那水煎包一面焦脆，三面软嫩。咬上一口，脆而不硬，香而不腻，汤汁四溢，味道鲜美至极。那层薄薄的焦壳，像蝉翼，仿佛吹弹可破，实则不然，一口咬去，焦香四溢，弥漫在嘴里，缠绕在味蕾上，久久不肯散去。

记得小时候，买水煎包需要粮票，一毛钱二两粮票是四个包子。如果谁提溜一个油晃晃的草纸包走亲戚，那是很有面子的事。

中华大地的每一种美食，都能找到与历史相对应的地方。说起水煎包，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两千多年前，刘邦与其母被秦兵追杀，逃至丰县东城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时母子

二人又饥又渴，恰好遇到一家包子铺正欲收幌关门，其母便向店主讨事。店主见二人可怜，就把烧汤剩下的粉丝剁细，再加入调料做成包子，随后又把包子放入平底锅中煎熟，并且用豆面、小米面混在一起熬成粥，让母子二人食用。刘邦与母亲食后顿觉精神倍爽，并得以顺利逃至沛县，免遭劫难。后来刘邦登基做了皇帝，仍然念念不忘那顿救命饭，于是特意从家乡请来了当年丰县开包子铺的那一家人，并将他们迁至长安新丰宫（今临潼骊山新丰宫），水煎包子也由此传向全国。

汝州一脉，当属嫡传。这是玩笑话。

所以说，不就是一个水煎包子吗？中华家的美食，还真不能乱扯，顺着历史的脉络，一扒拉就是两千多年。

改革开放初期，汝州市区的包子铺四面开花，特别是位于丹阳路西段和洗耳路中段的两个汽车站附近，包子摊一个连着一个，上车下车，只要时间允许，乘客们都会先吃几个点补点补，如果不能坐下来吃，也会买几个带到车上享用。现如今，汝州的包子铺都进店经营了，花色品种也更多了，但那种久久萦绕在味蕾深处、叫人思念的味道，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人可以忘，事可以忘，但小时候那或淡或浓的舌尖上的味道，和那种挥之不去的市井风情，是人一生中记忆最深刻的最悠远的，就像深深镌刻在大脑的最底层，抹也抹不掉。



汝州名吃

一场触目惊心的车祸

在一个阴暗的傍晚，乌云大片地压下来，狂风“呜呜”地刮着。

突然，一道闪光，一声雷响，豆大的雨水“哗——哗”地倾泻而下，好似天河之水涌入人间。小鸟们在屋檐下喋喋不休地“争吵”着，好像在议论着什么大事情。警车和救护车的“呜呜”声，拍照的“咔嚓”声和小婴儿的哭声在夜空中此起彼伏，构成了一首凄凉的交响曲。

半小时前，一辆红色的跑车在暴雨中“呜——呜”的发动着，突然，它像一头看到有人向它挥舞红布的公牛，发疯地狂奔过去。司机好像喝醉了，把车开得像一条向前行的蛇一样歪歪扭扭。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已经来不及擦掉了。司机不但没有减速，反而还加了点速度，忽然前面出现了一辆大货车，一阵“吱——吱”的刹车声后，紧接着“砰！稀里哗啦！”两辆车还是没有逃过撞车的厄运。只见那辆跑车的车头已经凹了下去，车窗也全都碎了，司机的头歪到一旁，血肉模糊，坐在安全座椅上的小婴儿放声大哭。有路过的司机打了110和120，不一会儿救护车和警车都“呜呜——呜呜”地来了。医护人员将伤员抬到救护车上，警察拍照取证……

这场车祸，让我想到了《流浪地球》中的一句话：“北京第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萌芽



夏荷

近日，我市云禅湖内的水面已有成片鲜荷绽放，偶有蜂蝶小鸟飞舞其间，一派生机勃勃的夏日气息，引得市民纷纷驻足观赏拍照。

张亚萍 摄

看蝉说蝉

●魏郭



图片来源网络

夏日早晨走过的小街街口，忽然变得热闹和拥挤起来。原来，这里多了一群赶早卖爬叉的小贩。

在这个临时拼起来的露水小集，一只爬叉可以卖到一元钱以上。想到这些小贩，为了挣得数十元或者上百元的小利，要在头天晚上手拿手电筒，穿梭于河谷沟壑、荒野僻壤，寻找茂密树林，甚至于通宵达旦，方能觅到数十美味。第二天早上，自己又不舍得享受，而端到这里卖掉，可谓挣的是辛苦钱。

而当我看到一支支大小不等的水盆里，一只只爬叉拼命爬动，想要逃离水盆，甚而已经死掉的样子，心里总有一种不忍直视的感觉，甚至隐隐作痛。

爬叉是蝉的幼虫。此情此景，儿时乡野之间伏天中午捉蝉的情形，一幕幕浮现眼前。

我的故乡是靠近暴雨河的一个小村子，村子虽小，却有一条县乡公路和一条军事铁路穿村而过。少年似乎是永远不知道疲倦的，尤其是伏天的中午，躲过了大人们的管教，偷偷溜出去捉蝉或者上树逮金金虫，是常有的事儿。

找一支长长的木棍，从村头柏油路上晒化的沥青路面抠下一疙瘩，抹在木棍的顶端。引几个伙伴，循着蝉声走到树下，仔细找到枝杈间它鸣叫的位置。把木棍一点点靠近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粘过去，那蝉儿就在惨叫中被收入囊中。

当然，蝉是很灵敏的虫儿，有时候你还没走到树的跟前，它已经察觉到了悄悄逼近的危险，噤若寒蝉。所以捉蝉如同钓鱼一样，需要足够的耐心，静心等待蝉儿的再一次鸣叫，慢慢靠近它落脚的树木。

一只蝉，可以让我玩上两三天，直到它最终没了生命。那时候，乡村生活是贫瘠的，死掉的蝉儿最终在煤火里被烤成一顿美餐。而在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或者深秋的秋雨过后，总会汪着水的地面不经意拾到一只或者数只湿透翅膀坠落的蝉儿。

此后在我离开故乡的许多年里，甚至如今早已双鬓华发，更为为人父，依旧对幼年的这段时光充满了回忆和眷恋。有一次从朋友口里忽然听到了蝉儿的生

命历程故事。这个凄美的故事，让我终于把儿时的捉蝉旧事定格成了一种乡愁式的记忆。

朋友告诉我，蝉从卵到成虫不仅要经过至少三年甚至长达十余年的地下生长，而当它爬出地面，却只有数周的生命，所以它的鸣叫可以说是最后的绝唱。

原来，蝉是将卵产在树枝上的，一次产卵数千个。卵孵化后，这几个兄弟姐妹，靠着微薄的营养，最终活下来的却仅有几个。这些羸弱的幼虫，在枝条上苟活的时候，有蚂蚁的不断侵袭，有饥渴的非常考验。一部分顺着树干顽强地爬到地面，一部分因为枝条的腐烂而坠落地面。从此开始漫长黑暗中的历练。

在地下黑暗中，蝉的幼虫寻找到树根，利用自己天生的刺吸设备，吸食树根里的汁液存活，从而慢慢地长大。在那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的岁月里，它们蜷缩着身子，无法自由活动，看不到光明的未来。若蝉有思想，破土而出的信念可能是它们活下去的唯一支撑吧。

十年磨一剑。当它们终于在酷暑的雨天或者雨天后，把泥土扒开，慢慢地爬出来。

在一个黑乎乎的夜晚，它带着硬壳来到这个世界，唯一感受到的是清新的凉风。它慢慢地把壳子裂开，从里面钻出来，褪掉了浑身的泥土，变得干干净净。这一刻，它对世界充满了期待。微风中，它慢慢爬上树干，让自己

柔软的翅膀慢慢变得硬实和亮丽起来，准备亮一亮嗓子，开始平生的第一次歌唱。

然而，很多的时候，它正在脱壳，或正在蝶变自己美丽的翅膀时，突然遭到人类的袭击，那些隐忍的翅膀还没有露出来就夭折了，生命也随之戛然而止。

最终逃脱了所有厄运的蝉儿，终于幸运地到达了枝头，发出了第一声断断续续却无比动听的音乐。而这等待了数年之后的歌唱，也只有四周到六周的时间。

自从听了朋友讲述的故事后，我特别关注这个可敬而又可怜的虫儿。每次听到它的歌唱，我开始变得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它的生命绝唱。我为自己有一年的春节买了大量冰冻的爬叉而感到忏悔与内疚。

今天，当我再一次看到那些未来得及实现生命第一声歌唱也是最后一次歌唱的虫儿，被大量捉来成为人们大快朵颐的美味的时候，一种复杂的情绪笼罩在我的心头。

我不会向它们解释爬叉脆弱而又可歌可泣的生命历程，他们当然也不会听我的解释。我只有选择匆匆离开。

也许我有点多愁善感和杞人忧天。但对于生命的尊重，尤其是这种拼尽全力而换来片刻欢歌的生命，我们更应该懂得尊重。

愿蝉儿的歌声能够再嘹亮一些，再聒噪一些。



诗词世界

咱当兵的人(外一首)

●赵晓军

咱当兵的人
还是那个样
只是脱去了战袍
穿上了崭新的石化蓝装

咱当兵的人
还是那个样
只是把飞天利剑
换成了闪亮的油枪

咱当兵的人
还是那个样
只是把一座座加油站
当作了常年驻守的海疆

咱当兵的人
还是那个样
只是把服务区
变成了整洁靓丽的营房

咱当兵的人
还是那个样
昨天我守护一片蓝天
今日我库站巡检值岗

咱当兵的人
还是那个样
时刻不忘鱼水情
顾客之急装心上

咱当兵的人
还是那个样
怀念八一军徽
托起灿烂朝阳

八一抒怀

脱去一身乡土气，
终圆大梦换戎装。
钢枪撑起平安伞，
柔骨初成铁板墙。
镇海蛟龙惊霸盗，
倚天长剑指豺狼。
红星伴我心无憾，
血染军旗万代扬。

“八一节”有感

●马俊杰

八一战友来相聚，
重温旧梦话今昔。
回首从军十余年，
艰辛荣光浮眼帘。
摸爬滚打在军营，
习武练兵皆能行。
解甲不忘初心志，
砥砺奋进增芳菲。
惜时恨短不尽兴，
待到明年重相逢。

欣接光荣之家牌(新韵)

●赵晓军

陋室独吟醉仄平，
忽闻小鹤上枝鸣。
当年入伍红花戴，
今喜光荣进院庭。

征稿启事

《今日汝州》副刊2019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集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 1.文字稿件体裁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稿件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中小学生学习作文。小学生作文不超过500字，初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图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民俗文化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再现良好的精神文化风貌。邮箱：rhzs2008@163.com

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4月15日），《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

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就是要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6月13日)

要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我国能源利用方式粗放，能源效率偏低，能源消费总量过多。国家统计局统计，二、一三年能源消费总量为三十七亿五千万吨标煤，但各地统计汇总结果可能远大于这个数。我国能源消费量占到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二，而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百分之十一。点五。这就是说，我国单位能源产出效率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敞开口子消费能源，不仅我国资源、环境不可承受，全球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如果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每年就可以少用一半能源。节能即减排，少用一半能源，就能大量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PM_{2.5}排放。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6月13日)

有人担心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会影响发展，这大可不必。过去，我们不太注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太注重能源供给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这种观念和做法到了必须改变的时 刻了。我们当然要继续发展经济，但要根据能源资源禀赋、通过能源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改善来带动经济增长。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形成提高效率、集约高效利用能源的倒逼机制。单位产出用能下降了，原来的能源消耗总量可以支撑更大经济规模，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也可以提高。所以，必须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住，这是首要任务。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6月13日)

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要推行农业标准化清洁生产，完善节水、节肥、节药的激励约束机制，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更好保障农畜产品安全。对山水林田湖实施更严格的保护，加快生态脆弱区、地下水漏斗区、土壤重金 属污染区治理，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2014年12月9日)

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希望继续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加强运行管理，深化水质保护，狠抓节约用水，保障移民发展，做好后续工程筹划，使之不断造福民族、造福人民。

就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作出的指示(2014年12月)，《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3日

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住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在云南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5年1月19日—21日)，《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地球第三极”，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如果把青藏高原生态破坏了，生产总值再多也没有什么意义。青藏高原生态十分脆弱，开发和保护、建设和吃饭的两难问题始终存在。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8月24日)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真抓实干才能见效。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就是一项硬措施。这就是说，既要控制总量，也要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的强度。这项工作做好了，既能节约能源和水土资源，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也能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绿色水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2015年10月26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82页

“十一五”规划首次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提出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现在看，这样做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根据当前资源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在继续实行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耗强度双控的基础上，水资源和建设用地也要实施总量和强度双控，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合理分解落实。要研究建立双控的市场化机制，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更多用市场手段实现双控目标。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2015年10月26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82—783页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一些地方地方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当前，国内粮食库存增加较多，仓储补贴负担较重。同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走低，国内外市场粮价倒挂明显。利用现阶段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充裕的时机，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2015年10月26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83页

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也是从源头上保护生态环境的根

	
一、风穴寺暨塔林	
 <div>风穴寺始建于北魏，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寺院依山就势而建，布局错落有致，是一个汇集历代建筑的大型古建筑群，现存唐至清代建筑140余间，有“古建博物馆”之美誉。在风穴寺现有的建筑中，唐、宋、元、明、清历代建筑都有。如唐朝的七祖塔，宋代的悬钟阁，金代的中佛殿，元代的罗汉殿，明代的毗卢殿、地藏殿、天王殿、观音阁、望州亭、翠岚殿、恩波亭、桂香庵、奎光塔、接圣桥、玉带桥、大慈泉等；清代建筑有方丈殿、三官殿、六祖殿、伽蓝殿、官厅东西配殿等；还有形制各异的上、下塔林，保存历代高僧墓塔115座，以及碑碣、壁画、砖石木雕等艺术珍品。</div>	
 <div>风穴寺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虽系北方寺院，却具有江南园林的建筑特点，整个寺院建筑错落有致，布局合理。建于寺院中心的七祖塔为九层方形密檐式空心砖塔，是现存唐代砖塔珍品；宋代宣和七年(1125)铸造的大铁钟，高6尺余，口面4.6尺多，厚4.6寸，重9999斤，钟上铭文清晰，对宋代冶铁业研究极有价值。中佛殿是全国仅存的金代殿宇两座之一。据业内统计，风穴寺塔林现存古塔数量在全国排数第三。</div>	
 <div>风穴寺暨塔林于1963年6月20日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div>	
 <div>238.揠圃(bǎi hē)者，天地之道。揠圃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div>	
 <div>——《鬼谷子》</div>	
 <div>【释义】揠圃是世间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揠圃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使事物阴阳对立的各方面发生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交替一样，来促使万物发生变化。世间出现的纵横、离开、归复、反抗等现象，都是通过揠圃来实现的。</div>	
 <div>【感悟】“揠圃者，天地之道。”鬼谷子认为，揠圃普遍存在于世间，促进万物发生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不变则痛，善变则通。</div>	
 <div>239.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失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div>	
 <div>——《鬼谷子》</div>	
 <div>【释义】阴阳两相谐调，开放与封闭才能有</div>	

本举措，虽然提出了多年，但落实不力。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31页 要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2015年10月29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31页 在生存条件差、但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护修复的地区，可以结合生态环境保护 and 治理，探索一条生态脱贫的新路子。不少地方既是贫困地区，又是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自然保护区，还是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如西藏、四省藏区、武陵山区、滇黔桂部分贫困地区等。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力度，对贫困区二十五度以上的基本农田，可以考虑纳入退耕还林范围，并合理调整基本农田保有指标。中央财政用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资金使用不够精准，有些被省里截留平均分配了，有些拨付到县里后被挪作其他用途了。要做些改革，比如，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可以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成护林员等生态保护人员，从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中拿出一点，作为他们保护生态的劳动报酬。

《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日)

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如果一个城市过度集中产业、过分拓展功能，人口就会过度集聚，就会占用更多农田和生态用地。一旦人口和经济规模超出水资源承载力，就不得不超采地下水或者从其他地区调水。当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比例失调时，环境容量就不可避免变少，污染就必然加重。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我国古人说：“城，所以盛民也。”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清水秀。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山水林田湖是城市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随意侵占和破坏。这个道理，二千多年前我们的古人就认识到了。《管子》中说：“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若水若泽。”事实上，我们现在一些人与自然和谐、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逐步建成的。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使城市内部的水系、绿地同城市外围河湖、森林、耕地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要大力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瑞士等国提出了“重新自然化”概念，将河流修复到接近自然的程度，很值得借鉴。要停止那些盲目改造自然的行为，不填埋河湖、湿地、水田，不用水泥裹死原生态河流，避免使城市变成一块密不透气的“水泥板”。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要控制城市开发强度，划定水体保护线、绿地系统线、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历史文化保护线、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防止“摊大饼”式扩张，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0日)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月5日），《人民日报》2016年1月8日

长江和长江地带的地位和作用，说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月5日），《人民日报》2016年1月8日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实施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江生态保护。要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正确处理好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真正使黄金水道产生黄金效益。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月5日），《人民日报》2016年1月8日

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要增强系统思维，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使沿江各省市协同作用更明显，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

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1月5日），《人民日报》2016年1月8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

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思路要明确，建立硬约束，长江生态环境只能优化、不能恶化。要促进要素在区域之间流动，增强发展统筹度和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要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产业发展要体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求。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2016年1月27日

森林关系国家生态安全。要着力推进国土绿化，坚持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加强重点林业工程建设，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要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质量优先，坚持封山育林、人工造林并举。要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宜封则封、宜造则造，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要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搞好城市内绿化，使城市适宜绿化的地方都绿起来。搞好城市周边绿化，充分利用不适宜耕作的土地开展绿化造林；搞好城市群绿化，扩大城市之间的生态空间。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予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要整合设立国家公园，更好保护珍稀濒危动物。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2016年1月27日

现在，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所以说，科技创新是核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16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1页

移民搬迁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子，如果都集中在不能生存、不能生产的地方，也会破坏当地的生态条件，形成恶性循环。把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的群众搬出来，到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发展，让原来的地方宽松一点，生态也能得到改善修复，这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原隆村视察时的讲话(2016年7月19日)

要加强绿色屏障建设，实施天然林保护和三北防护林工程，加强六盘山、贺兰山、罗山等自然保护区建设，继续推进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要强化源头保护，下功夫推进水污染防治，保护重点湖泊湿地生态环境。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绿色发展长效机制、科学决策机制、政绩考核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

在宁夏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6年7月20日)

我要特别强调黄河保护问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现在，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高达百分之七十，远超百分之四十的国际公认的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警戒线，污染黄河事件时有发生，黄河不堪重负!宁夏是黄河流出青海的第二个省区，一定要加强黄河保护。沿岸各省区都要自觉承担起保护黄河的重要责任，坚决杜绝污染黄河行为，让母亲河永远健康。

在宁夏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6年7月20日)

青海的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三江源地区被誉为“中华水塔”。青海湖是阻止西部荒漠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结点。祁连山作为“青海北大门”，其冰川雪山融化形成的河流不但滋润灌溉着青海祁连山地区，而且滋润灌溉着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被誉为河西走廊的“天然水库”。青海独特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大面积湿地生态系统，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遗传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是高寒生物自然物种资源库。所以，青海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无法替代。

另一方面，青海又地处青藏高原，生态就像水晶一样，弥足珍贵而又非常脆弱。全省七十二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百分之九十属于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区域。这决定了青海保护生态环境的范围广、任务重、难度大。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是青海又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来不得半点闪失。

《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节选)》(2016年8月24日)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要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自然恢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要从青海实际出发，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全面得到加强。要统筹推进生态工程、节能减排、环境整治、美丽城乡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三江源和环青海湖地区生态保护，加强沙漠化防治、高寒草原建设，加强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建设，加强节能减排和环境综合治理，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决守住生态底线，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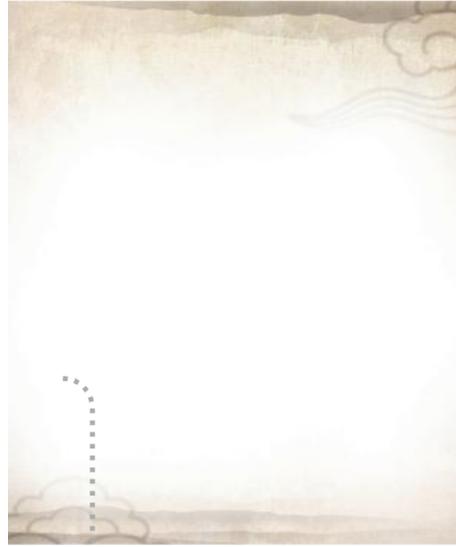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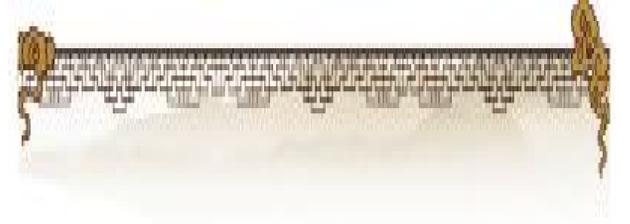
《在青海省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节选)》(2016年8月24日)

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北京城市规划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问题，把握好战略定位、空间格局、要素配置，坚持城乡统筹，落实“多规合一”，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着力提升首都核心功能，做到服务保障能力同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应，人口资源环境同城市战略定位相协调，城市布局同城市战略定位相一致，不断朝着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前进。总体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就具有法定效力，要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在北京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7年2月23日、24日)，《人民日报》2017年2月25日 北京的发展要着眼于可持续，在转变动力、创新模式、提升水平上下功夫，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努力打造发展新高地。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硬约束，确定人口总量上限，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对大气污染、交通拥堵等突出问题，要系统分析、综合施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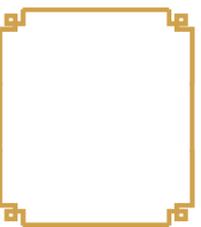
在北京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7年2月23日、24日)，《人民日报》2017年2月25日 近些年来，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取得显著成

新奥燃气
温馨提醒



**汝瓷专家
论汝窑**
●王振芳 范随州

汝州市信息中心 主办
大红寨汝瓷文化传承基地



周恩来:知道你眼睛不好,身体怎么样?

毛泽东:身体还可以,眼睛也没有事,只等它成熟了。又说,你身体不好,还让你到我这里来,又是坐飞机来。

周恩来:我有些事,还得请示你,我不来,怕有些事说不清,我也不放心。

毛主席指着沙发,让总理坐下,说:来,慢慢谈。周恩来转达了中央各同志对毛泽东的关切和祝愿。

毛泽东当时身体状况不佳,病情时有反复,所以他对周恩来说,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不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五次泳。就是讲话、脚、腿。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腿。毛泽东身边茶几上放着准备好的纸笔,代言用的,说着说着他就会用红蓝铅笔写一两个字,以帮助自己表达意思。毛泽东风趣地用湖南方言说,脑壳好,肚子好。就是腿不行了。

周恩来听后,立即蹲下身撩起毛泽东的裤脚,用手按按他的下肢问:有没有浮肿啊?

毛泽东问总理:你的病怎么样?

周恩来简要地报告了病情,说: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问题。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在硬挺着。他对周恩来说,老了,人老百病生。明年一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以后,你安心养病吧。你可以到外边走一走,像汉口、长沙。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吧!

对王洪文,毛泽东则比较冷淡。

据有关记录,这一天毛泽东就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对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 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

毛泽东说,这次你们来,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这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谈的是人事安排。

关于邓小平,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指指脑袋,然后又指指王洪文)Politics(政治)比他强!王洪文听不懂Politics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他没有邓小平强,边说边在纸上写了一个“强”字。

周恩来汇报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又在纸上写下“人材难”几个字,周恩来领会了,讲出“人材难得”这个词,毛泽东便把笔放下了。

毛泽东又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关于副总理人选,当周恩来念到: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毛泽东插话:说了一个“陈”字,即陈锡联。

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说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

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

12月24日,毛泽东再次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

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

周恩来讲到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已去世了!毛泽东这样说无非是表示总政治部主任现在还没有合乎理想的人选。

12月25日,毛泽东又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王洪文又一次透露了他们一伙要权的野心。毛泽东当即严厉批评了他。

毛泽东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

1973年底,王洪文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中央读书班作过一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报告,在湖南广为传发,造成极坏的影响。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到长沙后,负责省公安厅工作的高文礼向他反映湖南传发王洪文的这个报告,周恩来让人找来审看后,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非组织行动,在中央读书班作了这样的报告,进行了严肃处理。

“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深为掌握不了“枪杆子”而不安,提出造反派要武装。借口对民兵进行改造。各地纷纷成立了民兵指挥部,成为帮派活动的基础。10月18日,王洪文来长沙,还曾向毛泽东推荐上海在“文武武”基础上建立民兵指挥部的“新经验”。他还指责湖南的民兵工作搞得不好,要湖南派人去上海学习。在他的鼓动下,一些帮派人物活跃起来,造反夺权,要成立民兵指挥部。他们纠集一些人来长沙,窜到省委群众闹事,扬言要占领省委大院。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省委采取措施,首先加强了对与省委仅一墙之隔的九所师的警卫力量。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当着王洪文的面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情况。毛泽东说:“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对湖南造反派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

毛泽东在谈话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申了1971年视察南方在长沙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责令王洪文几个人“都要作自我批评”。特别是对王洪文几番替江青、张春桥代言,毛泽东非常不悦,当面批评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王洪文惶恐地连连点头称是。当王洪文走出毛泽东住室时,他的秘书廖祖康发觉王洪文变得闷闷不乐,双眉紧皱。

在长沙,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严厉批评,不得不按毛泽东的责令写了一夜检讨。回北京后他把检讨锁在抽屉中,抱着侥幸心理希望毛泽东不再追问此事,以便就此过关。谁料想后来身败名裂时竟被专案人员搜出来,成为他的一份绝妙的自供状。

12月25日,周恩来此次来长沙,原定三天。按预定行程,周恩来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言犹未尽,挽留周恩来再在长沙住三日。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后,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讲:好了好了,毛主席批准我再住三天。

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工作人员早早地将毛泽东的住所认真地打扫了一番。并采来毛泽东喜爱的蜡梅和白茶花,点缀在客厅里,盘几上还摆上毛泽东家乡特产:一盘灯芯糕,一盘交切糖,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远道而来商议四届人大事宜的周恩来,和盛情的湖南省委工作人员,悄悄地为毛泽东过在湖南的这个生日。

这天,毛泽东走出卧室,走到会客厅,看到桌上摆了自己喜爱的蜡梅和白茶花,便会心地一笑。他显得愉快,慢慢走过去,从花瓶里取出一枝蜡梅,闻了闻,然后又轻轻地插回原处。工作人员请他品尝家乡的点心,他拈起一根灯芯糕送到嘴里,吃了一筷子长寿面,抿了一口芙蓉酒,然后指着酒瓶,要大家喝完,不要浪费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送的苹果、葡萄,菲律宾马科斯总统送的卡芒果,他都赠送给工作人员一饱口福。

中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照多年来的规矩,吃面条,叫长寿面,以表达他们的衷心祝愿。他们也给毛泽东送去一碗面。据说,工作人员为了祝贺毛主席生日,特意挑选了一瓶湖南出产的白酒“仿茅台”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拿起装酒的白瓷瓶看了一眼,浅浅地尝了一口酒,说“这酒很好,是取白沙古井的水酿造成的酒,质量和味道都不错,叫‘仿茅台’不好,叫‘白沙液’好了!于是,这种长沙酒厂新出品的白酒便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取名为“白沙液”。

26日下午,周恩来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毛主席生日到了,我请大家吃餐饭,一起高兴高兴,不叫为主席祝寿。你去通知省委负责同志,安排一下。傍晚,张平化等省委负责人、湖南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应邀来到周恩来在蓉园的住处聚餐,为毛泽东祝寿。一共开了两桌。周恩来平时生活十分俭朴,用餐从不超过四菜一汤,为了表示给毛泽东祝寿的意思,他破例请厨房多加了几个菜。按照周恩来的交代,这两桌酒菜由他掏钱。席间,周恩来不时和省委同志谈工作,并鼓励工作人员,要他们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让主席休养好,保证主席的健康。周恩来抱病饮了新命名的白沙液酒,举杯说:“同志们,为主席的健康长寿干杯!”

26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参观韶山,晚上,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

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两位老战友商议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央各主要负责人的优缺点作了认真的分析和议论。最后商定开了四届人大人事安排。

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再次强调:“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重申了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毛泽东还就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作了三点重要部署:

一是制止武斗、反对派性,加强对民兵武装的统一领导;二是解放干部,在四届人大以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把他们解放出来;

三是释放战犯,把“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

关于江青,毛泽东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江青的工作是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出意见。对江青当然可以一分为二,她在批判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就不对了。周恩来建议,这一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毛泽东表示同意。

关于批林批孔,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他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的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四书五经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早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早打倒了。他表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

周恩来说,在一二月份,江青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的大会,我们也负责任,政治局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说过有些是我们“怂”起来的。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是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事要有所准备。要弄清苏联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他问周恩来,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周恩来说,如果他真想来谈,可以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毛泽东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要把十届二中全会开好,把四届人大开好。不要受他们“四人帮”的干扰,也不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闹他们的,你做的。

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看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不同的所有制变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在党中央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

12月27日,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见毛泽东。

临别时,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他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冷淡地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数据》),两本。我也是啊。”谈话到此结束。

当天,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正式传达,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12月30日,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指示的第二天,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

1975年1月1日,长沙天色阴沉,寒风伴着小雨。为了使毛泽东在除旧迎新的这一天能过得愉快,工作人员对六号楼作了一点小小的布置。他们在门上贴上“爆竹一声除旧岁,梅花万点迎新春”的大红对联,为新春佳节增添一分喜庆的色彩。然后,他们破例为毛泽东燃放了一挂浏阳鞭炮。周福明回忆说,放不完的鞭炮烟花,他们带回北京去,后来又为毛泽东放过一次。

长沙的天气不好,放鞭炮时毛泽东不使出户观看,工作人员便打开门窗,让他就坐在客厅里向外观看。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每天早、晚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虽然已是步履维艰,但他仍习惯地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再再讲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时而他还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但对视力微弱、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已只能以心去感受这块熟悉的土地了。

1月4日,毛泽东在江青12月30日来信上批示:“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我可以一阅。”

当天,李德生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免除他的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当天,毛泽东即在信上批示:“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

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政治部主任。

7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钱,信却写给机要秘书张玉凤。毛泽东对江青要钱这件事斥之为“为自己准备后路”,不屑一顾。

8日至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9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

当天,毛泽东会见了明托夫总理等马耳他贵宾。

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一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报告》,是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中的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定稿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要求把“四个现代化”作为重点来写,以便与三届人大的提法相衔接。这也是整个《报告》的精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二是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

16日。毛主席会见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席兰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夫人等贵宾。邓小平以新的身份陪同外宾到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委以重任。

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她还要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对王海容、唐闻生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海容、唐闻生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他接着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1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毛主席已圈阅”的《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禁止在派性活动的地方成立“民兵指挥部”之类的机构。重申党对武装力量和民兵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使王洪文等人妄图进一步强化“第二武装”、利用民兵力量向党中央讨价还价的梦想未能得逞。

1月23日,在大局既定、大势已去之下,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出于内心膨胀不止的野心所驱使,硬着头皮独自飞往长沙。

江青住进湖南省委蓉园二号楼,虽与毛泽东所住的九所只隔一个省委大院,近在咫尺,却如远距天涯。江青找不到什么高明的理由去见毛泽东,只好是以探病的名义,带来了一些毛泽东喜欢吃的玉米、小米、花生和水果,待了两天才到九所六号楼毛泽东住处去。一见毛泽东,她便谎称是来看主席的,带来了自己种的花生请主席尝尝,说想去主席的家乡韶山看一看。毛泽东洞晓她的真实来意,看不惯她的虚伪做作,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斥问之后,不再理睬。江青在长沙待了五天,终于不敢向毛泽东亮出心中的真实想法,只好悻悻地返回北京,徒劳往返一趟。

25日,邓小平在总参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

26日,叶剑英写信到长沙,向毛泽东建议新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增补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为常委。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发出1975年3号文件,建立健全了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进一步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天,毛泽东应工作人员的要求,同大家分别照相留念。毛泽东由秘书和服务人员搀扶着,来到六号楼前的坪里,毛泽东首先招呼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郭国群、曾彰谋,接待处负责人肖根如,以及张玉凤一起照了合影。然后,毛泽东又和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合影。

在长沙,毛泽东基本上过得较舒畅,加上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他体重比来时略有增加。但有时也很烦闷。陪他在长沙休养的汪东兴后来谈到那段日子时说,那時候,大事既多又乱,准备四届人大,配备领导班子,接待外宾,“四人帮”向文元、向主席伸手要权。主席原想去休养,治疗白内障,期望身体康复后再去动手术,可是“四人帮”还去干扰他。在这些岁月里,主席心情是很沉重的。

毛泽东心中。此时还牵挂着周恩来。为筹备和召开四届人大,日理万机,过度操劳,周恩来的病情恶化了。有关他的病情报告不时送到长沙。毛泽东总是要机要秘书马上念给他听。听时,他默默无语,心中为老战友担忧、难过。2月2日,机要秘书给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念周恩来的病情报告,说周恩来每日便血。毛泽东听完,非常伤感,费力地一字一句地对机要秘书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机要秘书马上按他的意思给总理值班室打了电话,询问了周恩来的病情和饮食起居情况,并转述了毛泽东的亲切问候。这时,毛泽东才稍微安心,在病榻上吟诵着张元干的《贺新郎》词: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遣。更南浦,送君去。

2月2日,毛泽东在长沙批准周恩来关于国务院正副总理分工问题的意见,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了毛泽东批准的这一国务院总理分工方案,并再次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周恩来对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14位同志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第一,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2月3日(春节前八天),清晨一觉醒来,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长沙。

理由很简单,他不愿使繁忙工作了114天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住在长沙期间不好这个春节。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本想再去离这里不远的家乡韶山看看,拜访一下父老乡亲,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韶山有关部门也已

做好接待准备。但出于健康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能够如愿。他临走时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

3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到达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

2月5日,毛泽东离开南昌去杭州。

这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6日晨,专列到达杭州,毛泽东住汪庄招待所。

当年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回忆:

2月4日,中央办公厅的保密电话打到了浙江省委,毛泽东将从湖南乘专列抵达杭州。

这年,毛主席已8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仍风尘仆仆到浙江视察。当时,毛主席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眼急需治疗,可毛主席只同意治疗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继续看书、读报、批阅文件。

这次毛主席从湖南到杭州来,金华是必经之地,当时,浙江派性斗争又掀起狂澜。金华地区武斗频繁,愈演愈烈,已不是一般的舞枪弄棍。造反派动用了步枪、机枪、手枪、手榴弹,还有掷弹筒。每天乒乒乓乓,枪声爆炸声不断。接到中办通知后,省委向金华造反派下死命令:2月6日将有重要“外宾”专列途经金华,无论哪派有人开枪一枪,都要拿派头是问!然而,“文革”以来天下大乱,党中央的命令造反派尚且看对不对“口味”,往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更何况连续被冲击被批判的省委的指示。

6日晨,毛主席的专列徐徐驶进良山门车站。

谭启龙和我走进列车车厢,原本坐在沙发上的毛主席,身体向前一倾,搁在沙发扶手上的双臂一用力,没人搀扶自己站起身。从他利落的动作上看,很难想象面前是位82岁的老人。

毛主席先握住我的手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我心里一惊诧异: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不知为什么谭启龙没吭声,我便接口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那是几天前,省委在杭州饭店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聚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他们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才把人从造反派手中夺过来,但杭州饭店被造反派占领了,干部会议只能易地召开。在“造反有理”的氛围之中,干部除了作自我批评还有什么理可言?

落座后,恐怕因为熟悉谭启龙,毛主席面带微笑地先问我:

“铁瑛同志,你是谁的人哪?”

“河南人,南乐县的。”

“在哪里读书的?”

“在保定二师。”

“哦,保定二师,那个学校,好学校。”毛主席明显带有赞赏的口吻,“谈谈心里情况吧!”

于是,我们就汇报了省里的生产情况: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省里许多工厂停工,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生产形势很好,还炼出特等钢,批林批孔以后,造反派说:多生产几吨钢铁算什么?苏联钢多,不还是修歪了?农村也受武斗影响,浙江鱼米乡,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

毛主席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有的地方点点头。前后谈了20多分钟。直至我们再三请主席下车去宾馆休息,他老人家才停止询问。

毛主席毕竟已是八旬老人,身材又魁梧,下火车已不太方便,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费了点劲,才下到站台上。汽车送毛主席穿过市区向西湖的南岸汪庄驰去。

毛主席住在汪庄一号楼。此次杭州之行,他主要是医治眼疾。前后在杭州住了两个月零五天。省委分工我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所以,白天我去省委开会、工作,晚上住进汪庄六号楼。

这次,到了杭州的毛主席,户外活动减少了。显然,他的手脚不那么方便了。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毛主席仍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看书,还委派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张耀祠把谭启龙和我找去,听取浙江省的工作汇报。

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2月10日,毛泽东同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谈话。

铁瑛回忆:

2月10日,我乘车赶往汪庄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要找我谈话,了解浙江的情况。
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L运动遗留下来的成堆问题的真实情况。还是随当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我没有犹豫,毅然选择了前者。尽管自1974年以来,我被大小会批斗了数十次,批我否定“文化大革命”,请隐士、举逸民,宣传唯生产力论等等,纲越来越高,造反派甚至想把我划到林彪死党之列。那时我已年近花甲,被批斗一年多,不知人瘦,只觉原身量体裁制的衣裤变得晃晃荡荡。可是,我从不愿意说什么假话,更不愿把责任推给下面。我当时心中有一个信念是从没动摇过的。

我把省里存在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一一汇报了。最严重的是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甚至出现了本人尚且不是党员,却已当介绍人,发展了七八名党员的荒唐事。

“还有这种事?这种做法不对,应该纠正。”毛泽东感到愕然,继而又摆了摆手。

讲到造反派冲进省县以上干部会议,抓人又占据杭州饭店时,他显然非常气愤,当即叫来汪东兴,说:“去打一个电话给王洪文: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很快,中办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并作出了果断决定。经过考虑,毛泽东同意了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此一举,对杭州市起了稳定作用,无法无天的派头头的嚣张气焰受挫,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市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自由”了。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春节放假,眼科专家唐由之还在家里休假。警卫局的同志专门到家里请他做好准备,第二天乘飞机出去执行任务。在飞机上,唐由之根据太阳的方向,断定飞机在往南飞。飞机即将降落时,他看到雷峰塔的旧址。作为杭州人的他,知道他执行任务的地方是杭州,可是到杭州来做什么呢?

这时飞机上有人对他们几位医学专家说,这次来是给毛主席看病,毛主席第二天要接见大家。大家一听,简直惊呆了,个个

顿时激动万分。

第二天,唐由之跟着汪东兴到西湖畔的一幢别墅里,看见一个老人坐在沙发里,头发花白,眼睛没有什么神采,穿着一件旧浴衣,浴衣上打着补丁。他还在迷惑: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吗?外面不是一直说他老人家身体非常健康吗?

他不禁想起1974年底的几次专家组织的会诊,那时他们专家们得到的只是病历,根本不知道病人是谁。唐由之当时断定,这个病人一定是个很一般的人物。果然,他的判断没有错,这个病人就是毛泽东。

毛主席当时已经82岁了,还是努力要从沙发里站起来迎接大家。那一天毛主席正患感冒,唐由之忙抢步上前说:“不敢当!不敢当!”但毛主席还是执意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毛主席同张晓楼大夫握手时,诙谐地说:“看来你的楼盖不大了,永远是小楼。”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于是专家们开始为毛主席检查,诊断为白内障。

“我一直有一种预感,这回的任务要落在我头上了。”唐由之回忆说,“果然如此,一想起这次任务的重大,我一个星期都睡不踏实。后来汪东兴叫我去上海准备医疗器械。”

唐由之发现毛主席的房间里除了彩电, 其他物品全是国货,连腕上的手表都是一块老“上海”牌。于是,他准备的医疗器械也全是国货。

准备好医疗器械,毛主席已经回北京了。

2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

2月27日,毛泽东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

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代:“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

2月底至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1972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姚文元在同一天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毫无根据地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那以后,周恩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春桥、姚文元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3月5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央起草了

《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

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

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

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当天,北京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

3月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350人。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293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1975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

3月20日,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状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

休息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1974年11月19日),彭德怀(11月29日),滕代远(12月1日)和李富春(1975年1月9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4月2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枪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3月21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江青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4月2日,董必武同志逝世。毛泽东参加了董必武同志治丧委员会。

5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毛泽东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4月7日,首都隆重举行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

4月13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

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81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13日晚8时,毛泽东离开杭州返京。

当晚8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回忆:

4月13日晚上,我们省委正开会,突然接到中办领导同志的电话:主席今晚要走,谭启龙、铁瑛两位书记快来!

我们急忙向警卫处要车(那时警卫制度甚严,只有警卫处的车才准进汪庄),心急如火,足足等了40分钟汽车才到。我们立刻赶到汪庄,中办领导同志迎过来:你们怎么才来,毛主席想跟你们再谈一谈,现在来不及了,赶快去吧。我们赶到火车站时,火车已经启动,隔着玻璃窗,毛主席看见了我们,他神情安祥地向我们挥了挥手。

14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稍事休息,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了金日成。

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